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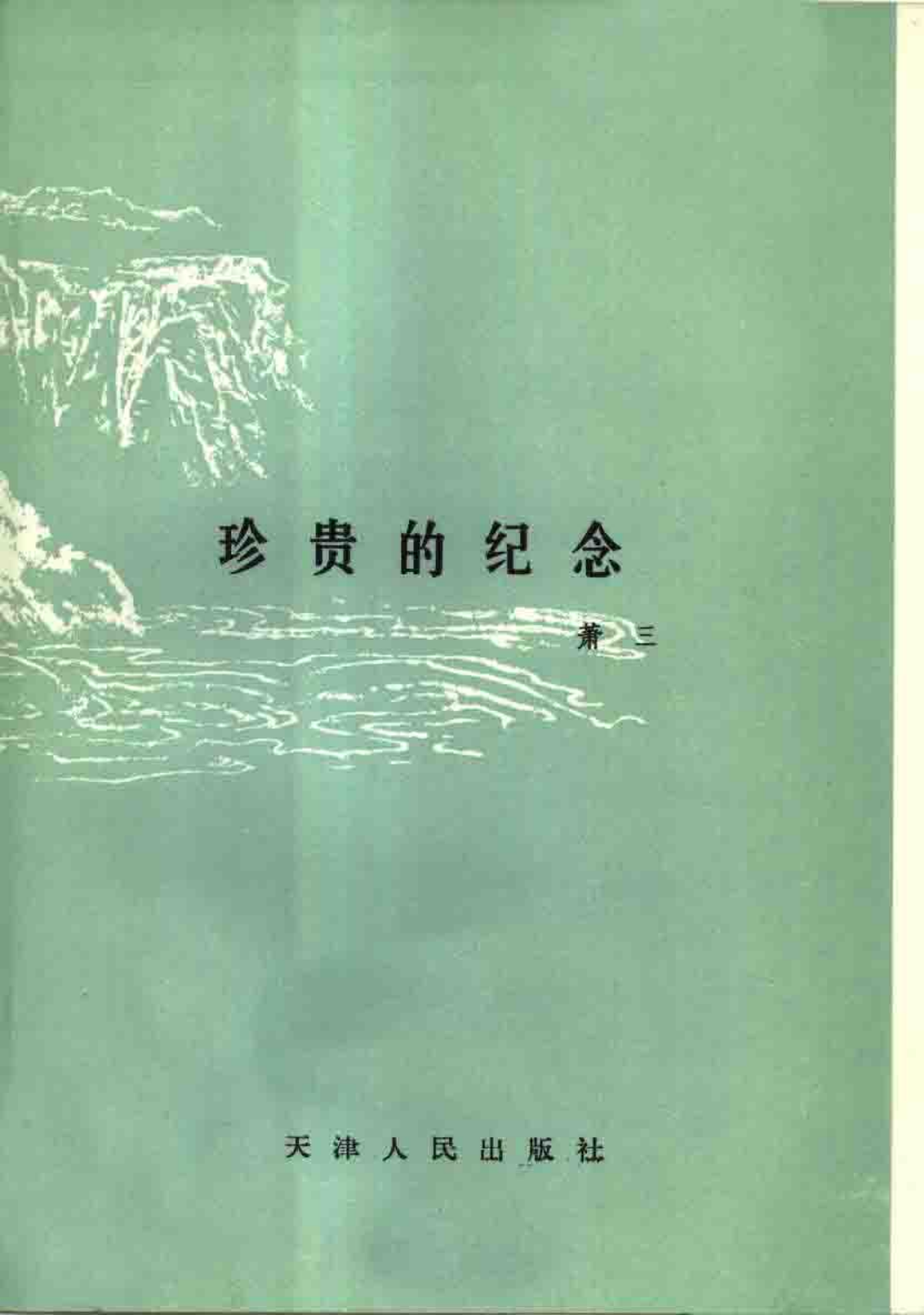


ZHENGUEIDEJINIAN

萧 三



珍贵的纪念



珍贵的纪念

萧三

天津人民出版社

珍贵的纪念

萧 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 4.875印张 110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3072·586

定 价：0.54元



萧三同志在北京（一九八一年冬摄）

目 录

向一个好学的人学习	(1)
寻找“蓬莱仙岛”	(6)
忆秋白	(9)
月下常思君	
——怀念蔡和森同志	(14)
不能忘却的怀念	
——忆何叔衡同志	(22)
怀念赵世炎同志	(28)
回忆王若飞同志	(38)
颂“火中的凤凰”	
——怀念叶挺将军	(44)
用生命为人民播撒幸福种子的人	
——忆邓发烈士	(49)
李大钊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55)
朱总司令的故事	(61)
贺龙将军 (一)	(71)
贺龙将军 (二)	(83)
警卫英雄李树槐	(94)
续范亭先生	(98)

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	(106)
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111)
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片断·····	(115)
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	(127)
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	
——在“东大”一年半的日子 ·····	(136)
守护在列宁身旁·····	(141)
人老心不老 愿作老青年·····	(145)
我与诗·····	(147)
编后记·····	(152)

向一个好学的人学习

(为纪念党的六十周年而作)

我们党已经历了整整六十个年头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全党始终在斗争中不断地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党的事业要靠人继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重担要靠千百万后来人承担。今天我们要纪念党的六十周年，要学习和宣传党的六十年来历史，就不能不宣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毛泽东和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而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的学风和好学的精神。在这里，我所要讲述的，是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寻求知识、刻苦好学的动人事例。

毛泽东出自农家。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田地里劳动。八岁时入了本乡的私塾。到十三岁时他停了学，白天要在田里作一个成年人所作的工作，晚上还要帮助他父亲记帐。他在当时是全家识字最多的人。就因为毛泽东从小经常和农民在一起，所以他很知道中国农民生活的痛苦和他们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在开始上私塾时，是个十分严肃的孩子，从不随便说笑、打闹。功课没做完，他从来不出去玩。当时，私塾馆里所教的经书，枯燥无味，非常难懂。小学生学起来，特别吃力。毛泽东虽然从心里不喜欢那些经书，但他特别聪明，记忆

力很强，领会得也快，读上几遍，就能背得出来。剩下的时间，他就自己学习。他非常喜欢旧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说唐》、《说岳》、《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他总是读了又读，甚至都能把书中的情节背下来。每当放牛或劳动完了的时候，他经常对别人讲述，和大家谈论。有时小伙伴们一起玩，他就让大家扮演书中的人物，演“武松打虎”。他们演得很象，看的人都喊：“再演一回！再演一回！”

毛泽东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每天晚上的时间，他都要紧紧抓住，来读书学习。可是，他的父亲却很不高兴：一来，儿子读的不是经、史，而是一些“杂书”；再则，晚上看书，浪费灯油啊！因此，父亲经常阻拦毛泽东晚上看书。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晚间看书的时候，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外面看不见屋里的灯光。他悄悄地在屋子里，坐在豆儿大亮光的油灯下，贪婪地读着他在乡下所能找到的一切书。还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毛泽东去野外放牛。他让牛吃草，自己却在一棵大树下看起书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读书入了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牛跑到邻人的菜园里，去吃菜了，把园子里的菜糟踏很多，他也不知道。邻人发觉了，气冲冲地赶来，他赶忙道歉，跑进菜园，把牛赶了出去。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了一些小说之后，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些书里面只是写了帝王将相，而没有正面表现农民呢？后来他才懂得：那些人都是统治阶级，自己不种地，叫农民为他们劳动。从这一疑问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小就懂得关心劳动人民。

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春天，毛泽东从兵营里出来，决定继

续求学。那时候，湖南办了许多学校：各种实业的、商业的、政法的学校……毛泽东先后投考了几所学校，但都不满意。有的才念一个来月就退学了。

再继续看广告，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到省立第一中学去投考，结果考取了第一名。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欢迎他。但又怀疑他的文章不是自己做的。最后，又举行面试，结果证明他才智过人，受到大家一致的赞扬。毛泽东就这样进了第一中学。他在这所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感到课程太肤浅了，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因此，在这所学校只念了半年，他又离开了。但第一中学有位国文教员很喜欢毛泽东，认为他具有文学的才能和倾向。这位先生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他看得很有趣味。由于看了这部书，他觉得自己读书，自己研究，比进学校更有益处。于是，毛泽东拟定了一个自修的读书计划。

长沙城里有个定王台，并不很高，站在台上也望不了多远，但有座楼，当时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就座落在这里。图书馆楼上有各种中外书籍，楼下大厅是阅览室。这个图书馆刚开办不久，每天去看书的人也不多。但每天一开门，就有一个穿着朴素、高高个子的年轻人，不急不缓地走进馆里来。他借到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前，用心地看，一直要到闭馆的时候才出去。这个年轻人，天天如此，风雨不误，他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读书，只在中午的时候，才出去买个包子或烧饼，用来充饥。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他“一到了图书馆，就象牛进了菜园，拚命地吃！”毛泽东什么书都找来读，有关中国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都读。在这期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

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社会通论》等，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总之，凡是当时从外文译成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在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当经过这里时，总要站立许久，仔细地看一看。他觉得天下真大，他的眼界也开阔了。

毛泽东白天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回“湘乡会馆”住宿，这样勤谨而贫苦的生活，又过了半年多。在这段极为宝贵的期间内，他获得了许多的知识。但是在家里的人看来，他不进学校，不谋职业，是不正当的。因此停止了对他的经济供给。这时，他寄宿的“湘乡会馆”，也因被军队占用，不能再住下去了，只得另找栖身之处。他又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宜教书。这样，二十岁的毛泽东，于一九一二年春，又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同年秋天，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刻苦钻研，虚心求教。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自己就是这“四多”方法的实践者。所谓“多读”，就是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对重要的书或文章要多读几遍，达到精、熟的地步。少年时，他读过韩愈的古文和唐宋诗词，无不读到能背诵出来的程度。他爱读诗，能背诵四百多首古诗。他喜欢唐代诗人中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喜欢他们作诗的浪漫色彩。他自己写诗填词，也富有这种特点，可以说是气势磅礴，而又十分精美。所谓“多写”，就是课堂上写听讲笔记，课后自学时写读书笔记。读文章就要摘录其中好的句子

或段落。经过多年积累，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就有好几大网篮。“多写”的又一项内容，是他在看书时坚持写眉批。例如一本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来万字。毛泽东在书的眉头上，却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中，有简单地表示赞同、反对、怀疑的话；有很多地方，则是根据前人的学说，加以综合、概括、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眉批的墨迹也有两种到三种，有些是对前面的批语，又加以批判和补充。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是多么勤思苦想，严肃认真。所谓“多问”，就是他除在本校学习以外，还经常走出去到社会学习。那时，经常有些外省的名流学者来到长沙讲学。毛泽东常常去拜访他们，虚心向他们请教，总想多得到一些新知识。长沙有人组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船山的学说，毛泽东也常去听讲。他常对人说：学问就是讲的又“学”又“问”，二字连起来成为一个名词，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毛泽东在师范学校里，共念了五年半书，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夏毕业留校。

五十多年后，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从此，毛泽东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

毛泽东从小就体会了“开卷有益”这句古话，一直到后来，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只要能找到书报，他总是尽可能地读，真有“手不释卷”之概。许多和他在一道工作多年的同志们都异口同声钦敬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好学的人！”

一九八一年二月

寻找“蓬莱仙岛”

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致力于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会务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会友同学和一般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有一种十分吸引人的印刷物到了长沙，这是宣传赴法勤工俭学的材料，我们看了都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向外发展的好途径。此刻，我们尊敬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到北京去了。北京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赴法勤工俭学之举又是北京的一些人，如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提倡的。主持者在北京、保定一带办法文学习班，受这一运动宣传品影响的湖南青年（骨干是新民学会会员，第一师范及各校学生），纷纷去保定、北京学法文，也学工艺。蔡和森带领几十个青年学生去保定布里村学法文，我和几个人到北京，和本省及浙江省的中学生办留法预备班。毛泽东和第一师范同学罗学瓚、张昆弟等同路到达北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巷七号公寓。七、八个人挤着睡在一个炕上。

当时，北京大学校内出现了许多组织，课外活动相当活跃。各种会社如哲学研究社、新闻学研究会都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闻学会请名记者邵飘萍来演讲。毛泽东都去听，我也去听过两次，新闻学会后来还举行过结业式。

在北京，我们除和一般青年共同组织活动之外，毛泽东和

我们少数旧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又有个别的活动。

和在长沙时一样，我们经常到杨怀中先生家里去请教。杨先生那时住在北门（地安门）外豆腐胡同。毛泽东就住在杨家。我们去那里总是呆大半天。和在长沙时一样，杨先生和老夫人及杨开慧总是殷勤招待，留吃午饭。还是和在长沙一样，每人两双筷子，一双公筷。饭前饭后谈学论道，讨论时事。毛泽东当时就不打算出洋赴法，他要留在中国（研究学问和救国之道）。但在北京居住要花钱，杨先生把毛泽东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每天登记来馆看书报的人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内事，每月薪金八元。毛泽东要求不高，能糊口就得了。馆长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同志兼任，馆里有许多关于中外各种思想学术以及当时新文化的书刊。李大钊同志很器重毛泽东，认为他是湖南学生的领袖。

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泽东仰慕他们。杨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

一九一八年冬，我们这批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生派一人先去法国作先遣，主持人也认为有必要。毛泽东对这事出了许多力。

冬天到了，毛泽东和我都想到，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我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但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眼力所及的十里海面上，冰块高低不平地躺在那里。我们俩都很失望。但是既然到了海口，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我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他向西，我往东，走到前面，忽然

眼前出现一个木头房子，在迷茫的雾气中闪烁着隐约的火光。我径直朝它走去。只见屋内一个中年以上的人在生火，在劳作。他看到我，奇怪地问：“你从哪来？”我答说是南方人，打算来看海的……一会，毛泽东也进来了。主人表示欢迎，给我们泡茶喝，同我们谈话。我们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支支吾吾，不肯说真话。我们也就不问了，谈些别的话。（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这位老人住在海冰上的真意。）坐了一会，我们又分头绕了半圈，才走到原地会合。但毛泽东回来得迟，我等了好久好久，觉得脚都冻了。我问他，哪儿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在回北京的车上，除我们外几乎没有别人。我们最苦的是两脚冻得很，车上也不生火，没法子，我们索性脱了鞋，两人对坐着，把脚伸到对方的裤腿里去取暖。到了北京，下车后，各往自己原来的住所去。这就是我们的大沽口——看海之行。

后来，一九三九年我回延安在毛泽东处吃饭时，他还回忆起这次“旅行”，并对人们说：“我那时真希望找到蓬莱仙岛哩……八岁的时候，我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忆 秋 白

我认识瞿秋白同志是在一九二二年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正值严冬季节，欧洲平原一片茫茫白雪。我乘火车从巴黎经柏林，又改乘海轮到里加，再乘火车到莫斯科。当我来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值班室，窗口内坐着几个女同志。她们问我是谁？找什么人？我拿出护照。一位女同志看后，就打电话到里面，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中国人。我一看是刘仁静，我们以前在国内就认识了。他当时还未下班，于是他就带我到“柳克思”大旅馆——各国代表们的住处。

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屋子里人很多，其中有陈独秀、张太雷、伍廷康等，也有些不认识的。经介绍，我认识了秋白同志。秋白同志聪颖、睿智，博学多才，谈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识分子。秋白同志待人非常和善，没有一点架子。他对我十分亲热，问长问短。

我说明了我来这儿的经过情形，又谈到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了“少年共产党”（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他们的工作、读书、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秋白等几个同志听后异口同声地说：“叫他们都到莫斯科‘东大’（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来好了。”

当时秋白等同志问我的打算，我正踌躇不决。他们就建议我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任弼时、罗亦农等同志在场，也极力怂恿。于是我决定留下来。

秋白同志关切地问我：“你恐怕还没有吃饭吧？走，我带你吃点饭去。”于是他领我到食堂，用自己的饭票给我买了饭。

饭后又是秋白同志亲自为我安排了临时住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底下的储藏室。这里的电灯彻夜通明。里面放了许多床架、草垫之类的东西。秋白对我说：“今晚你暂时在这里住一夜吧，明早我就来接你。”可能是因为太疲劳了，秋白走后，我便合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半夜冻醒，我便拿了草垫子盖在身上，呼呼直睡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秋白同志就匆匆跑来接我。领我到“柳克思”旅馆，招呼我吃了早饭。

见到陈独秀，他对我说：“我和秋白等几个同志商量过了，你暂时留在这儿，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间再说”。

后来“东大”的同学便把我接了去，又发给我学生制服，还有备外出用的毡靴、红军的大衣和帽子。

我们住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五十三号（现为高尔基大街）二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那儿有不少人，记得有肖劲光、许之桢、张伯简，还有彭述之，人们称他为“孔夫子”。罗亦农、任弼时住三楼的一间屋，王一飞同志也在楼上。

我刚入“东大”时，在法文班上课，后来转到中国班。秋白同志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此后不久，秋白同志奉调回国，担负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

大革命时期，秋白同志做了许多理论方面的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编辑、主编，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在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上海大学任教务长，主持社会学系。他亲自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秋白同志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听课的人往往屋里屋外、窗前门口比肩接踵，十分踊跃。

一九二五年，秋白同志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深刻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他的种种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的著名小册子中，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封建家长作风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全党的拥戴。秋白同志还全文翻译了斯大林关于列宁的演讲，改题为《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他还先后写了《共产国际当前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反对陈独秀与机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等文章。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党中央时，我同秋白同志经常见面。在会上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秋白同志发言后，每每自译成俄文（因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不劳王一飞同志代译（王一飞同志，浙江人，很早就牺牲了），他的俄文水平是很高的，他还通法、英等文字。

一九二八年底，我到莫斯科，又一次见到了秋白同志。那时，他参加党的“六大”，以后就留在莫斯科作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此期间，秋白同志研究问题很多且很深。比如：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及中国字拉丁化字母问题等等。